

# 士绅、僧人与平民的 三种金鸡桥叙述\*

——明前期泉州社会的“变”与“不变”

杨园章

---

**【摘要】** 现存成化年间由泉州士绅和僧人撰写的两种金鸡桥重修碑记，以及天顺年间晋江下游平民的金鸡水利计划文本，是理解明前期泉州社会的重要线索。朱鉴等士绅推重辉煌的宋元历史记忆，定浩等僧人凸显僧人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王廷慎的计划则反映出晋江平原村落居民由从事海上贸易到经营农田水利的生计转型。我们从中固然看到了泉州“逝去的繁荣”，但亦可见当地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生存策略与生存空间，以及旧有传统仍然具有一定生命力的基本事实。经由金鸡桥，我们不仅能往来于晋江两岸，还可对明前期泉州社会的“变”与“不变”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

**【关键词】** 明代 泉州 金鸡桥 区域社会史

**【作者简介】** 杨园章，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4) 10 - 0146 - 14

---

## 一、引言

2021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

---

\* 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泉州多元文化传统的发展与中华文明包容性研究”（2024QQJH146）的资助。匿名评审专家和责任编辑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特致谢忱！

遗产名录》，其价值主要在于完整体现了宋元时期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贸易体系与多元社会结构。<sup>①</sup>这集中反映出学界对宋元时期泉州的基本认识，亦即王铭铭指出的，各种异域文化“在明以前汇合到此”，展现出“一种世界形象”。<sup>②</sup>然而，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入明后泉州的地位明显下降：成化八年（1472年），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创设的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sup>③</sup>明中后期，闽南海上贸易的商业中心由泉州港转移到了漳州月港，后又为厦门取代。<sup>④</sup>同时，此前汇聚泉州的各种异域文化在元末明初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后，或销声匿迹，或改头换面，故王铭铭认为：“宋元泉州的文化多元主义模式，逐渐失去了它的影响力。”<sup>⑤</sup>

关于明代泉州经济是否逐渐衰落，当地社会是否趋于封闭，学界存在明显分歧。通过辨析苏基朗、王铭铭、蒋楠的观点，笔者曾提出：虽然在“繁荣”和“开放”的理解方面，蒋楠与苏基朗、王铭铭分歧较大，认为“宋元以后的泉州并未走向衰落，泉州的海洋传统也并未因明清时期的海禁而中断”，<sup>⑥</sup>但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可以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苏基朗探讨了自唐末至元代以泉州城为核心区域的市场和社会网络的建立，王铭铭还原了宋元明清时期泉州“城”进“市”退的过程，蒋楠则考察了在泉州城及主港衰落后城墙以外区域的发展，可视为对苏、王二人研究的补充。简单地说，泉州在上述时段的发展历程可概括为从散到聚，又从聚到散。<sup>⑦</sup>因此，我们不应急于对明代泉州是否衰落、是否封闭做出判断，而要首先厘清泉州社会在明代尤其是明前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金鸡桥，又称金溪桥，位于今南安市九日山南，跨晋江而立，溯流而上近8公里即东溪、西溪（晋江两大支流）交汇处双溪口；下游不远处便是丰州城（今南安丰州镇），顺流而下约8公里即泉州城。桥东南与紫帽山直线

① 参见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福建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汉英对照》，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0页。

② 参见王铭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页。

③ 参见沈玉水：《略论福建市舶司的迁司问题》，《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92~96页；陈明德：《试论明代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的原因及其影响》，《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9年第6期，第59~61页。

④ 参见苏基朗：《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946—1368）》，李润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

⑤ 王铭铭：《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⑥ 蒋楠：《流动的社区：宋元以来泉州湾的地域社会与海外拓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9页。

⑦ 参见杨园章：《明代泉州儒学的社会史考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1~17页。

距离6公里左右，循九十九溪可通六里陂、七首塘而抵海；桥西南则入南安境内各乡都，至于同安。早在以丰州为闽南政治中心的唐代以前，金鸡桥附近便是晋江南岸各地人员往来州治的重要通道；宋元时期，九日山祈风活动的频繁举行，更增添了金鸡桥的特殊意义；入明后，该桥仍是许多南安、同安人员前往县城、府城的必经之地。

金鸡桥始建于两宋之际，在南宋时期先后经历续建与重修。明永乐年间，金鸡桥毁于火灾，后虽经修缮，但旋又不敷使用。成化十一年，泉州知府徐源出面组织重修金鸡桥，现存最早的两种修缮金鸡桥碑记皆述及徐源的事迹：一为泉州士绅右副都御史朱鉴（1390—1477年）所撰《南安金鸡桥记》（原碑不存）；一为僧人定浩（生卒年不详）撰文、圆清（生卒年不详）刻石的纪事碑刻（今存九日山石佛亭后岩壁）。二者与天顺年间晋江下游平民的金鸡水利计划文本相得益彰，提供了关于同一事物的来自士绅、僧人与平民的至少三种分析维度，是我们理解明前期泉州社会的重要参照。进一步而言，相关讨论或有助于加强近代以来泉州研究的两种主要路径之间的关联性。<sup>①</sup>

## 二、朱鉴的记文：士绅复兴文运的渴望

朱鉴《南安金鸡桥记》云：

泉之南安县西数里许有大溪，古名金鸡渡。环溪之前后有金粟、紫帽、清源、翠屏诸山。东则翼以黄龙江，西则殿以飞阳庙，郡邑之胜概于是为最。讖云：“金鸡通人行，状元方始生。”宋宣和，给事江公谨，因葬母，造舟浮桥，建炎丁未始告成，梁文靖公适生。久，舟废。嘉定间，郡守叶廷珪命守净募缘，创为石墩，架以木梁，覆以楼阁，人甚便焉。是时文靖公名魁天下，其言足征也。入国朝洪武二十三年鉴始生，又九年道经于此，桥之規制犹有存而未毁者。永乐初，梁阁没于灾，仅三五石墩存焉，人复病之。又十年，为今成化乙未，太守徐公悯人病涉，乃谋诸同寅，欲修缮之。有工师李王生者告云：“水深数丈，无容措手足，未可为也。”公乃率同僚友往视，果如言。越数日，王生走报云：“沙涨数丈，功可举也。”公又与同僚友往视之，复如言。乃鳩工市材，命知县马燧、经历钟强董其事，与凡趋事施帑者，咸出于欢心。

<sup>①</sup> 王铭铭将近代以来泉州研究的路径归纳为两种：“在泉州历史之河流淌过的诸文明因素中，最引学者注目者，有两类：其一，在明以前汇合到此的各种异域文化；其二，发本土的、有顽强生命力的‘汉民间文化’。前一类因素，给予泉州一种世界形象，后一类，则与此大相径庭，突显这座滨海城市保留的乡土色彩。”见王铭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页。

迨兹岁五月朔日落成，沙忽退去，水深如故，然则桥之作殆有数欤？其规模视昔有加：墩十有七，每墩架桃木九十有九铺，巨梁有十，上则建长亭八十三间，傍则翼遮屏三十有四。雄哉斯桥也！金曰：“功成不可无纪。”太守曰：“知斯桥之颠末，今之老成惟都宪朱先生在。”遂以记请。予曰：“先正谓平政君子，‘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若太守者，其知所以为政欤！”<sup>①</sup>

朱鉴，晋江人，永乐十五年（1417年）举人，会试乙榜出身，从学官起家；正统十四年（1449年），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景泰三年（1452年），被召回执掌都察院，因反对朱祁钰改换太子，乞致仕；此后乡居27年，在朱见深即位后晋二品阶资善大夫，卒于成化十三年，享年88岁。<sup>②</sup>朱鉴一生跨洪武至成化，不仅是明开国近百年间泉州地位最显赫的官员，而且交游广泛，在朝堂、地方与士林皆有巨大影响力。考虑到朱鉴的地位、声望与人脉，其所撰纪功碑对徐源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政治资本，故徐氏以87岁高龄的朱鉴熟知金鸡桥兴废历史为由请文，后者则心领神会地引用《孟子·离娄下》的至理名言加以回应。

据朱鉴年谱，天顺六年（1462年）五月二十五日，朱鉴游南安，“同县尹邹公珽观造金鸡桥”，当晚从龙江顺流而下，并有诗作。<sup>③</sup>是知前引记文在“永乐初，梁阁没于灾，仅三五石墩存焉，人复病之”与“又十年，为今成化乙未”之间明显有脱文，当记邹珽修金鸡桥事。此后，桥复坏，方有徐源修桥一事。成化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朱鉴“同郡守徐公等往金鸡告神兴工造桥”，次年正月二十三日，“贺太府上金鸡桥梁”，小字注“公为记见《愿学稿》”。<sup>④</sup>此“记”当即《南安金鸡桥记》。由金鸡桥于成化十一年四月告神兴工、次年正月上梁可知，记文“兹岁五月朔日落成”中的“兹岁”应为成化十二年。又据僧人定浩的纪事碑刻，“桥成，徐公以忧去未及庆成”，<sup>⑤</sup>徐源很可能在金鸡桥上梁后不久丁忧离职，后续工作则照常进行。从记文的内容来看，朱鉴先是通过“入国朝洪武二十三年鉴始生”云云强调自己作为百年兴衰见证者的特殊身份，以此突出徐源重修金鸡桥的历史性

① 朱鉴：《南安金鸡桥记》，何炯编：《清源文献》卷13《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37页。

② 参见朱得章等编：《朱简斋年谱》，李坚、刘波、吕淑贤编：《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253~392页。

③ 参见朱得章等编：《朱简斋年谱》，李坚、刘波、吕淑贤编：《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352页。

④ 参见朱得章等编：《朱简斋年谱》，李坚、刘波、吕淑贤编：《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387、389页。

⑤ 黄柏龄：《九日山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贡献，并与讖语“金鸡通人行，状元方始生”暗相呼应。接着，朱鉴详细描述了徐源两次勘察施工条件的经过，看似冗赘，但对比朱氏在景泰年间为谢琛重修泉州城外通济桥所作记文较为简略的过程描写，<sup>①</sup>这种“赘述”绝非八十多岁的朱鉴不善行文的表现，恰恰相反，他正是要通过从“未可为”到“功可举”、从“沙涨”到“沙退”证明徐源重修金鸡桥契合某种“数”——一种预示泉州文运即将复兴的天意，而这种“神迹”在后文所引僧人定浩的叙述中毫无踪迹可寻。

在整篇记文中，古老的讖语为重修金鸡桥赋予了形塑地方人文传统的重要意义。事实上，朱鉴所引“金鸡通人行，状元方始生”早在北宋末年已经出现，并深入人心，在《夷坚志》中即有“金溪渡讖”条：

泉州南安县金溪渡，去县数里，阔百许丈，湍险深浚，不可以为梁。旧相传讖语云：“金溪通人行，状元方始生。”郡人皆欲副其讖，姓金者多更名“通行”，姓方者更名“始生”，然莫有应者。江给事常自京师丁母夫人忧归泉南，建炎丁未，卜墓地于渡之南岸。工役者日有履险之劳。南安宰事江公谨甚，命暂联竹筏为小桥，仅可轻单往来，未几，复为水所坏。是年实生梁丞相，所谓“通人行”之语，其应如是。<sup>②</sup>

或许是后人抄录失误的缘故，朱鉴的说法与《夷坚志》存在不少出入，但在金鸡桥与泉州文运密切相联这一点上，二者完全一致。陈进国曾提出“学场”的概念，主要指“事关一个区域之文教事业、能诞育人文的公共空间秩序”，如地方儒学、书院、寺庙、文峰塔等“被地域社会群体幻像成有助于‘兴人文’或‘发科甲’的场所”，亦即“学场是一种由士绅所设定的人文空间秩序和文化‘象征场’”。<sup>③</sup>陈进国还进一步指出，“作为特殊的人文文化公共空间，地方儒学与一个地域的文教事业或科名关系最大，自然被历代官僚、乡绅等预设了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形式和幻象”，<sup>④</sup>而金鸡桥即泉州文运所系。值得注意的是，明前期泉州士人的科举成绩乏善可陈，在省内几乎敬陪末座，同昔日的盛况形成极为鲜明的反差。根据《闽省贤书》所收数据，泉州士人在宣德至成化时期福建乡试的成绩，相比洪武至永乐时期出现了进一

① 参见胡之赜等纂修，中共晋江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整理：《晋江县志：清道光版》卷11《津梁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20页。

② 参见洪迈撰，何卓卓校：《夷坚志·夷坚丁志》卷11“金溪渡讖”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29~630页。“梁丞相”即梁克家，晋江人，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年）廷试第一。

③ 参见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4页。

④ 陈进国：《信仰、仪式与乡土社会：风水的历史人类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页。

步下滑，从大体保持在省内占 10% 的名额，跌落至竟有一半科次的占比不及 5%。<sup>①</sup> 明乎此，便更易于理解朱鉴笔下徐源重修金鸡桥的多重意义——不仅促进了交通往来，而且给处于低谷的泉州士人以强烈的心理暗示，重新唤醒了封存于其内心深处的对宋代辉煌科举成绩代表的繁盛时代的记忆与渴望。

泉州士绅渴望重塑辉煌的心态还反映在营建铁炉庙和城内水道等学场上。在重修金鸡桥前三年，由泉州知府徐源、泉州卫指挥同知秦琨领衔，众生员列名重立永乐初年杨曜宗所撰《铁炉庙记》的活动，也可视为营建学场的一部分。铁炉庙原为五代留从效造兵器之地，宋代曾从龙未登第前曾在此祷告，后于庆元年间高中状元，故该庙在嘉泰年间得以重修。此后历久庙废，至建文年间，方由通判洪葆捐俸倡修，庙旁乡耆曾志民、陈志高等人任事。<sup>②</sup> 据《闽书抄》，铁炉庙供奉的应魁圣王“为文章司命，盖天神也，其灵可梦云”，<sup>③</sup> 被认为是主管科举文运的神明。又据朱鉴年谱，成化九年五月初十日，朱鉴与徐源“观开城中河道”，“从兹文运大振，粮道亦通”；十一天后，朱鉴又同郡邑长官“改晋江学门”，<sup>④</sup> 以期扭转风水，可见他曾多次参与营建泉州学场的活动。

借助朱鉴的记文及其提供的线索，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经历长久的科举低潮之后，泉州士绅积极致力于营建学场，展现出改变自身和地方命运的强烈愿望。

### 三、定浩的碑刻：僧人参与公共事务的传统

在九日山石佛岩东北后方石盆外壁上有明僧慈中石砚石盆纪事石刻一通：“本□□□四□君□砚舍□□□□□寺僧慈中立。大明成化十一年端午记。”<sup>⑤</sup> 成化十五年，又有定浩的重修金溪桥及秦君亭纪事碑刻：

金溪桥，宋嘉定间，郡守叶命僧募缘成桥以通人行。至国朝永乐癸未回禄。至成化乙未，郡守徐公源按郡，见桥圯，人病徒涉，命县令马燧召匠计工再造，委能干耆老黄裳督之，黄葵、陈继明募缘助之。桥成，徐公以忧去未及庆成。逮己亥夏，黄裳、黄葵、赵柔、洪昆请僧纲司前都纲迪庵禧，赞桥落成，集诸山僧众智心、德严、静懋等于石佛岩

① 参见邵捷春、邵明伟辑：《闽省贤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缩微胶片。

② 参见杨曜宗：《铁炉庙记》，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5~76 页。

③ 何乔远：《闽书抄·方外志·泉州府神仙异人》，福建省图书馆藏明刻本，第 14 页 b。

④ 朱得章等编：《朱简高年谱》，李坚、刘波、吕淑贤编：《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史部》第 3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81 页。

⑤ 黄柏龄：《九日山志》，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7 页。

结夏。裳等与禧游，观岩右有古迹秦君亭久废，议欲鼎新，辄捐资倡始，而裳等募缘共成。今亭成，夏毕，住山慈中偕圆清来告刻石，予拙陋无文，始直述其事，以纪岁月云耳。成化己亥年七月望日。寺主定浩，岩主圆清主石。<sup>①</sup>

该碑位于石佛岩附近，距金鸡桥不远，是僧人与耆老在合力重修秦君亭后，融修桥、修亭二事为一体所立的纪事碑。作者定浩当是九日山某座寺庙的住持，刻石者圆清则很可能是石佛岩的住持，总之二者都是九日山的僧人。与朱鉴不同，僧人既不在意“金鸡通人行，状元方始生”的讖语，以及重修金鸡桥指向的振兴泉州文运的努力，也未提及“沙涨”“沙退”等修桥时出现的“神迹”。相反，被朱鉴忽略的“耆老黄裳”等的作用在僧人这里受到高度重视——金鸡桥得以重修，离不开他们监督工程、筹措资金的辛劳。

在石佛岩结夏期间，僧人还发现秦君亭古迹“久废”，遂募缘修缮。石佛岩，位于九日山西峰绝顶，因宋乾德三年（965年）陈洪进铸造石阿弥陀佛得名。<sup>②</sup>秦君亭，又名隐君亭，位于石佛岩近畔，为纪念唐代隐士秦系而建。秦系，越州会稽人，在安史之乱后避地九日山，于西峰下结庐筑室隐居，后为谪官至此的宰相姜公辅营葬，事毕“东度秣陵”，邑人思之，在其筑庐处建亭纪念，又将西峰命名为“高士峰”。<sup>③</sup>九日山现存许多崖刻皆涉及自宋至明初官员、士绅游览与修建秦君亭之事迹。<sup>④</sup>其中，有落款时间为南宋淳祐十二年（1252年）端午的崖刻，记载地方官赵竹屋捐俸重修三贤祠、秦君亭及铺造石阶之事，由住山慧珪题刻；<sup>⑤</sup>明洪武元年（1368年），泉州首任知府常性携僚属游九日山，亦有诗刻一段，提及秦君亭尚存。<sup>⑥</sup>然而，官员、士绅虽持续塑造秦君亭的意象和文化内涵，却轻忽对秦君亭的修葺，致使其在明前期遭遇“久废”的窘境，直到僧人“捐资倡始”才出现转机。

另外，从《南安金鸡桥记》对金鸡桥规制的详细介绍来看，该文的写作目的恐非朱鉴年谱所谓贺上梁而是庆落成，如此一来，即便徐源丁忧离任，按照常理，也应有别的官员到场主持落成活动。有意思的是，黄裳等在三年后又邀请前任僧纲司都纲惠禧（迪庵禧）“赞桥落成”。如果将之理解为某种庆贺完工的佛教仪式，那么对耆老而言，就相当于在官方之外又举办

① 黄柏龄：《九日山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笔者根据文意，对引文的标点略有调整。

② 参见黄柏龄：《九日山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③ 参见《新唐书》卷196《隐逸传·秦系》，中华书局1975年版，5608页。

④ 参见黄柏龄：《九日山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6、33~37、42~44、48~49、52、54~57、60~61、64~65、72、79、93页。

⑤ 参见黄柏龄：《九日山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⑥ 参见黄柏龄：《九日山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了一次（属于自己的）庆成活动。由此可见，朱鉴侧重于讲述官员的功绩，突出金鸡桥与泉州文运的关联；而定浩则强调耆老的贡献，以及佛教仪式对桥梁的加持。这种差异还提示我们，惠禧等僧人很可能并未受邀参加此前由官方主导的庆成活动，负责相关仪式的应另有其人。

惠禧的事迹多有可考者。今泉州清源山有成化十五年《南台室禅关开山记》崖刻，载僧人经营南台室始末。元至顺三年（1332年），僧白云在此修行，草创庐舍。明正统年间，僧明善敏敏等继住，后屋宇朽坏，已卸任都纲的惠禧云游返泉，“捐舍衣钵，谨募众缘”，加以营造，历时三载，遂成规模。室主福瑶向罪山请文，以纪念惠禧功德。文末有主缘、督工、禅衲、清信士诸题名。<sup>①</sup> 据此，结合前引重修金溪桥及秦君亭纪事碑刻可知，惠禧很可能在成化十五年二月南台室禅关竣工后受邀携众前往九日山，为金鸡桥落成举行仪式，当年四月即于石佛岩结夏安养。<sup>②</sup> 另外，惠禧还于成化十九年重修清源山瑞像岩佛寺，历时一年完工，由泉州士绅庄楷撰文纪念。<sup>③</sup> 综合而言，惠禧在清源山、九日山一带的僧人和善信中拥有相当的影响力，诸山僧众皆奉其为首。<sup>④</sup>

不过，相较于过往，僧人在明前期泉州公共事业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减弱。现有研究表明，自唐末至元代，寺院始终是泉州社会文化的中心，僧人在修筑桥梁、营建水利设施、普及社会福利等公共事业中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他们通过积极入世，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认可。<sup>⑤</sup> 然而，在经历了元末明初的战乱以及明王朝对宗教的整顿之后，泉州僧人的能量已大不如前。以桥梁而言，程光裕指出，宋代泉州僧人曾广泛参与筑梁活动，多有以术行著称者，如道询一人即“修造桥梁二百余所”，<sup>⑥</sup> 而笔者根据地方志统

① 参见杨清江：《南台岩志稿》，《温陵稽古录（续）》，香港风雅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89页。

② 结夏，指佛教徒在夏季集众修行。关于结夏开始的时间，说法不一，中国佛教徒一般取四月十六日为入安居之日，为期90天，至七月十五日终止。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862、977、2266页。

③ 参见庄楷：《重兴瑞像岩记》，郑振满、丁荷生编纂：《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1页。

④ 此外，惠禧还主持了成化年间晋江南天寺的重建事宜。参见吴英：《南天禅寺碑记》，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粘良图、陈聪艺编注：《晋江碑刻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7~28页。

⑤ 参见程光裕：《常溪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96年版，第490~514、1269~1297、1605~1628页；[日]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同朋舍1982年版，第145~180页；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241页。

⑥ 参见程光裕：《常溪集》，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96年版，第1617~1618页。

计的明前期泉州筑桥情况则显示，虽仍有若干僧人参与其中，但其影响已十分有限。<sup>①</sup>例如，在前引定浩的纪事碑刻中，未见僧人参与金鸡桥的修建活动；又如晋江安平桥，宋时由僧祖派始建，俟天顺三年重修该桥，亦未见僧人参与，而由乡耆主事。<sup>②</sup>究其原因，主要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虽然从唐代百丈怀海开始，便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门清规，但宋元时期泉州存在数量庞大的僧人群体，其供养主要来自海上贸易的获利而非农禅自给，在明王朝海禁政策的钳制下，丧失原有经济来源的僧人的活动能力自然也日渐衰微。此外，一些原先财力颇为雄厚的寺院的废弃也反映出僧人地位的下降。例如，晋江布金院（遗址在今石狮市）现存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由浙江平阳州匠人铸造的重约1500千克的铜钟（今存泉州开元寺），足以证明当时布金院的富有。21世纪初，在布金院遗址还挖掘出两座明代僧人墓塔，塔身上的条石刻有“大明宣德庚戌年二月布金院住山释立”<sup>③</sup>等字样，提供了关于明代布金院的十分罕见的信息。至迟在明正德年间，布金院已遭废弃。<sup>④</sup>

从定浩的纪事碑刻里，我们固然可以读出自唐代起泉州僧人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传统的延续，但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明前期泉州僧人的力量有明显的减弱，原先以寺院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秩序已然发生改变。

#### 四、王廷慎的计划：从海上贸易到农田水利

在徐源倡议重修金鸡桥前不久，晋江下游的民众即计划在金鸡桥附近开凿水渠，引水灌溉晋东平原，唯因各方反对而被迫放弃。对此，朱鉴与定浩皆略而不谈，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是由金鸡桥引出的第三种分析维度，是理解泉州社会在大规模海上贸易衰落后寻求转型的重要线索。

天顺年间金鸡水利计划详载于晋江沙堤王氏的家谱，后收入《太原王氏沙堤乡志》，兹节录如次：

福建等处承宣布政司泉州府晋江县二十六都臣民王廷慎，谨奏为水利民便事，伏睹天顺元年七月十二日节该钦奉诏书内一款：凡军民利

① 参见杨园章：《明代泉州儒学的社会史考察》，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29页。  
② 参见赵令衿：《石井镇安平桥记》，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粘良图、陈聪艺编注：《晋江碑刻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29~130页；陈弘：《重修安平桥记》，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粘良图、陈聪艺编注：《晋江碑刻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38页。  
③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福建卷》，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  
④ 参见黄河清：《追布金废院田地充为泉州府学田记》，陈国仕编，杨清江点校：《丰州集稿》卷8《记》，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37页。

病，许诸人直言无隐，钦此钦遵。臣切见本县十九都、二十三都、二十四都、二十五都、二十六都、二十七都、二十八都计七都居民四千五百户，秋粮米七千六百一十石。田土并无泉源，全籍盈塘、沙塘、濯缨塘、淤田塘、龟湖塘、石畔塘、拱塘计七塘潴积水灌溉，其塘原无活源，深一丈。今历年久，沙泥积浅，深无五尺。积水少不堪灌溉，若逾月不雨，田土缺水失收，人民饥窘，税粮难办。正统五年有知府尹宏，爱民如子，体知前项七塘田土缺水失收，民遭困苦，每询于众，令陈救济之方。其年三月十五日有农民杨用、王京生等八百二十三名，画图贴说赴府陈告，乞就本府南安县金溪桥上筑坝，立陡门，分安溪、永春溪流，引入长基洋埔，开透匏瓠坑至官塘，接本县三十三都斗林官前，潮水通洋屿、青茫等浦；于桥下另开一沟至普陀港。开透溜石南一湾，水自金溪直至本县十九都，以至等都山麓六十余里，水源长流灌注，田得有收，民无饥窘，税粮易办。本府官受理，躬亲踏勘明白，未及奏闻，尹宏病故，其事遂寝，至今不行，农民失望。如蒙准奏，乞飭该部官转行按、布二司，堂上官躬亲踏勘开凿疏通，听利民便……<sup>①</sup>

该引文主体部分为王廷慎（生卒年不详，晋江沙堤乡平民）赴京进本的前后文献，含奏本和皇帝、工部的批复，末尾是后人对此事结局的记述。引文仅节选王氏奏本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为金鸡水利计划的具体方案。天顺元年七月初，承天门被火烧毁，朱祁镇下诏大赦天下，引文所谓“凡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即出自相关诏书。<sup>②</sup>王廷慎借此机会，以“水利民便”为由赴京陈奏。金鸡水利计划的具体方案包括八个方面，涉及渠道选址、工程修建、人员安排和石料来源等，如“筑坝立陡门，合用蚶壳烧灰”<sup>③</sup>云云。

王廷慎奏本所及晋江县十九都等七都的灌溉水源来自盈塘等七塘，从更大的范围而言，这些都与塘皆位于晋东平原的六里陂—七首塘区域。六里陂是对烟浦埭等水利设施的统称，“埭九十有四，烟浦最大。承九十九溪来，广袤五六里，襟带南乡三十六埭，绵亘永清、和风、永福、永乐、沙塘、聚仁六里。县田三分之一仰溉于兹”，因其范围囊括宋代晋江永清等六里，故名；七首塘则是对盈塘等水塘的统称，“塘四十有一，七首最大，皆天塘也。曰古塘，曰盈塘……邑南乡故乏水利，皆仰七塘。塘水无源，易盈易涸”。<sup>④</sup>

① 王金城、王孝谦主编：《太原王氏沙堤乡志》，1992年内部刊印本，第360页。

② 诏书原文为：“凡军民利病，时政得失，并许诸人直言无隐。其在京各衙门大小官员各陈所见，以匡时政之失。言或乖谬，亦不加罪。”见《明英宗实录》卷280，天顺元年七月癸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6010~6011页。

③ 王金城、王孝谦主编：《太原王氏沙堤乡志》，1992年内部刊印本，第362页。

④ 参见何乔远编撰：《闽书》卷8《方域志·泉州府·晋江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189页。

从广义上讲，六里陂与七首塘可视为一体；就狭义而言，六里陂在西，承九十九溪诸流，七首塘在东，以水塘为要。至迟在南宋，六里陂—七首塘灌溉体系已基本形成，<sup>①</sup>相应的水利管理机制也在官方的干预下确立，并为后人不断巩固强化。<sup>②</sup>

宋元时期六里陂—七首塘区域的村落常有多种背景的人群共存，王廷慎家族的祖居地沙堤便在大、小沙塘（小沙塘又名濯缨塘）之间。据沙堤王氏自述，其始迁祖为元代千户王翰（1333—1378年）：

太始祖翰公……仕名那木罕。十六岁袭职授领兵千户，镇守庐州，有能名……自高祖以来，皆以赐姓唐兀为氏，迨翰袭职，乃冠祖氏王。元至正二十二年四月，翰公随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镇闽……至正二十九年，调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返闽道经晋江，寓居沙堤。<sup>③</sup>

洪武四年，王翰偕夫人刘氏与季子王偁“屏居永福观猎山”，朱元璋累诏，翰皆不出，最终自刭殉元。王翰次子王仲留居沙堤，系王廷慎先祖。<sup>④</sup>另据耆老口耳相传和地方志记载，沙堤为杂姓混居之地，有王、黄、杨、李、庄、萧、蔡等氏，还有色目人马速忽曾寓居于此。<sup>⑤</sup>不仅如此，在沙堤西面还分布着回回人后裔陈埭丁氏、信奉明教的青阳庄氏以及被丁氏告发参与白莲会的岸兜诸姓；<sup>⑥</sup>在沙堤东面的淤田塘附近村落则居住着不少前元勋贵，如曾担任蒲寿庚副手、后多次出洋招谕南海诸国的孙胜夫的家族祖居地就在塘市，<sup>⑦</sup>该地也是元末击败亦思巴奚兵的龚名安的家族根基所在。<sup>⑧</sup>此外，有必要指出的是，塘市还是元代晋江税务司的所在地，<sup>⑨</sup>堪称重要的区域市场中心。

① 参见林汀水：《福建历史经济地理考》，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4~52页。

② 参见〔荷〕费梅儿、〔中〕林仁川：《泉州农业经济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84页。

③ 王金城、王孝谦主编：《太原王氏沙堤乡志》，1992年内部刊印本，第174页。

④ 参见王金城、王孝谦主编：《太原王氏沙堤乡志》，1992年内部刊印本，第174、177页。

⑤ 参见王金城、王孝谦主编：《太原王氏沙堤乡志》，1992年内部刊印本，第177页。

⑥ 参见庄景辉编校：《陈埭丁氏回族宗谱》卷3《传记·府君仁庵公传》，香港绿叶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2页；粘良图：《从田野调查看明清时期泉州明教的走向》，《海交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2~105页。

⑦ 参见王颀：《元王朝与爪哇的战争和来往》，《史林》2006年第4期，第153页；〔日〕向正树：《忽必烈朝初期的南海招谕研究——泉州的军事、交易集团及其网络》，于磊译，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249页；陈丽华：《家荷帝恩：元代孙胜夫家族在泉州事迹考》，《福建文博》2018年第3期，第37~44页。

⑧ 参见《西偏西房龚氏家乘》，石狮市博物馆藏1936年稿本影印本，原文未标页码。

⑨ 参见阳思谦修，徐敏学、吴维新纂：《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4《规制志·杂署》，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349页。

对聚居在这一带的来源复杂的人群而言，农业生产并非其主要生计模式，是故相较于水利灌溉，彼时的六里陂—七首塘在海陆人员、物资交流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入明后，在官方禁止私人海上贸易并出台一系列社会控制措施背景下，修缮六里陂—七首塘灌溉体系以发展农业生产的活动逐步得到重视。在柯胡（Hugh R. Clark）等的研究基础上，苏基朗指出，自唐末至元代，泉州农业从以种植粮食为主转向重点发展服务于市场贸易的商品化经济作物，粮食则越来越多地购买自外地。这种农业的商品化是“区域内跨部门多元繁荣”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动力来自大规模的海上贸易。<sup>①</sup>然而，明朝的国策熄灭了泉州经济发展的引擎，使人们无法继续从事高利润的贸易，也就导致了经济作物种植需求的下降，以及粮食进口的难以为继。因此，修缮水利设施、提高粮食产量便日益成为泉州社会关注的焦点。例如，晋江《青阳霞浯家谱》载其四世祖吴仁福（1338—1395年）于“洪武十八年造清洋陂，兴筑水利，公以陂首董其役，捐赀效力，乡都利赖”。<sup>②</sup>又现存永乐十五年《重修清洋陂沿江斗门碑》记云：“沿江斗门，按旧载，其源上接九十九溪，下流烟浦入于海，灌田不下数千百顷。肇自云庵祖师，经始于宋嘉定二年，岁久埵泄妨（妨）农，迨大明永乐丁酉冬，梅屿洪公克正与宗弟绍文率诸同志募缘董工，重新砧筑，农无旱涝之忧……”<sup>③</sup>皆是明证。水利设施密集的地区往往亦多有桥梁，自唐末至元代，在海上贸易的刺激下，泉州更是掀起了建桥热潮。不过，不少石桥在天顺年间已遭废弃，故王廷慎的方案之一即将附溪近处四座“百数年来不用通道来往之桥”的石料，以及惠安县两处“推倒在海”的渡口的石料，皆充作筑陡门和堤坝之用。<sup>④</sup>另外，晋江税务司也在洪武初年改名税课局，并从塘市移建府城南门外。<sup>⑤</sup>由此不难发现，王廷慎关于金鸡水利计划的奏本，在本质上是明前期泉州社会转型的一种集中反映。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晋东平原的村落水利联盟雏形初现。如前所述，至迟在南宋，官方即已通过颁布塘规等办法确立了七首塘的管理制度，周边村落的关系也由此实现了某种平衡。据《闽书》记载，六里陂—七首塘区域的不少村落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手工业产品：“陈坑之民，织竹以为器；龟

① 参见苏基朗：《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946—1368）》，李润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1、75~83、90~91页。

② 《青阳霞浯家谱》，晋江市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一年稿本影印本，原文未标页码。

③ 《重修清洋陂沿江斗门碑》，晋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粘良图、陈聪艺编注：《晋江碑刻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④ 参见王金城、王孝谦主编：《太原王氏沙堤乡志》，1992年内部刊印本，第361页。

⑤ 参见阳思谦修，徐敏学、吴维新纂：《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4《规制志·杂署》，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版，第349页。

湖之民，细布而善酿；下浯之民，织席榨油；沟头之民，陶瓦砖；拱塘之民，线猪瘠土，食业不以传女婿。”<sup>①</sup> 这应是宋元时期长期发展的结果。换言之，以水利设施、商业贸易等为纽带，晋东平原的村落在明以前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网络。因此，王廷慎的金鸡水利计划实际上着眼于整个晋东平原，只要计划顺利执行，就可引水入盈塘等七塘，灌溉十九都等七都4500户民人田地，亦即从北侧为六里陂—七首塘区域注入水源，使各溪流、水塘连成一片，从而解决灌溉问题。不过，该计划最终没能付诸现实，王氏家谱将其原因归结为“内官钻代包直于上”，<sup>②</sup> 而事实上更多的反对声音应来自灌溉渠道经过的村落和北岸泉州城内的士绅和居民。<sup>③</sup> 较之宋元时期基于“区域内跨部门多元繁荣”形成的平衡，在明前期晋江平原的人们更多地将精力投入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当地有限的水源已无法满足使用需求，对水源的争夺自然愈演愈烈，具体来说就是争夺水塘，进而围绕水塘结成相应的村落水利联盟。金鸡水利计划遭到的反对足以说明：一方面，此前的平衡已被悄然打破；另一方面，晋江平原的村落水利联盟已初具规模，并在事实上起到了阻碍计划推行的副作用。至迟在嘉靖年间，十九都、二十五都和二十六都皆已形成以淤田塘为核心的村落水利联盟，而青阳和沙堤等村则或据盈塘、沿塘为已有，或分大、小沙塘之水源，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sup>④</sup>

虽然王廷慎的金鸡水利计划不了了之，但它反映出活跃于六里陂—七首塘区域的来源复杂的人群在明前期的生计转变，即从与海上贸易有关的行业转而投入农业生产，以获取基本的生存资源；同时，在水利设施营建等公共事务中，僧人已几乎不再发挥作用，以上两方面皆指向明前期泉州社会的转型。

## 五、结语

在嘉靖《惠安县志》中，张岳提出过这样的疑问：明朝“承平日久，民物殷阜”，“有余力以兴百务”，为何泉州反而没有像南宋时期那样掀起建桥热潮？在他看来，原因在于“宋海舶无禁，利入甚富且易，不捐之于桥梁、道路，则以崇侈释氏，无所爱惜”，<sup>⑤</sup> 一语道破了大规模海上贸易与自

① 何乔远：《闽书》卷8《方域志·泉州府·晋江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② 王金城、王孝谦主编：《太原王氏沙堤乡志》，1992年内部刊印本，第363页。

③ 参见杨清江：《“破金鸡，灌晋南”——晋东引水工程史事纪录》，《温陵稽古录（续）》，香港风雅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21~227页。

④ 参见杨园章、马文忠：《村落水利联盟对抗背景下的民国晋江尚书埭水利纠纷》，温春来主编：《区域史研究》总第7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21~141页。

⑤ 莫尚简修，张岳纂述：嘉靖《惠安县志》卷3《桥梁》，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版，第12页b~13页a。

宋代至明代泉州社会变化的关系。与之相近，苏基朗和王铭铭并不否认明清时期泉州海上贸易传统的存续，但这同他们定义的“繁荣”——前者指区域内“跨部门多元繁荣”，<sup>①</sup>后者则指“海外贸易高度发达，政治经济中心得以建立，文化多元局面形成”<sup>②</sup>——不可同日而语。诚然，正如蒋楠强调的，“中心港市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整个泉州沿海的衰落”，<sup>③</sup>明清时期泉州的人口、财富虽较以往均有所增长，但昔日誉满天下的泉州在此时已沦落为福建省平平无奇的一个府，这种巨大的落差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明前期泉州不同人群的心态变化在金鸡桥的案例里有集中反映。就在重修金鸡桥前不久的成化八年，福建省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是为泉州海上贸易阶段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泉州的科举成绩一直不尽如人意。在以朱鉴为代表的泉州士绅看来，知府徐源重修金鸡桥这一具有“神迹”色彩的事件呼应了数百年前“金溪通人行，状元方始生”的谶语，唤醒了泉州士人被深藏百年的辉煌的宋元历史记忆。而与朱鉴凸显徐源的贡献、强调营建学场不同，定浩则侧重讲述黄裳等耆老、惠禧等僧人在重建金鸡桥、修缮秦君亭等公共事务中的作用，指向至少在唐代即已形成的以寺院为核心的泉州社会文化秩序，提示人们关注僧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然而，较之过往，彼时定浩珍视的这种传统已有明显式微的迹象。苏基朗的研究表明，在泉州的海上贸易衰落之际，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攫取权力成为人们保护地位、财富的唯一途径，这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使得海上贸易机遇不再被众人所分享，从而也加剧了精英家族间的紧张关系”。<sup>④</sup>此类状况在明前期的泉州平民身上再次上演，当人们意识到无法从“区域内跨部门多元繁荣”中获利时，便将目光投向农田水利，极力争夺有限的资源，乃至出现村落水利联盟间的激烈对抗。

透过金鸡桥的案例，我们固然看到了泉州“逝去的繁荣”，但亦可见当地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生存策略与生存空间，以及旧有传统仍然具有一定生命力的基本事实。经由金鸡桥，我们不仅能往来于晋江两岸，还可穿行于“同一座城市的宋元和明清之间、‘海交’与民俗之间”。<sup>⑤</sup>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苏基朗：《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946—1368）》，李润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7页。

② 王铭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465页。

③ 蒋楠：《流动的社区：宋元以来泉州湾的地域社会与海外拓展》，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

④ 苏基朗：《刺桐梦华录：近世前期闽南的市场经济（946—1368）》，李润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页。

⑤ 王铭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2页。